

# 風中誓願



## 人物演繹故事

小說中的人物，應當如你我，是活生生、會自己跑跳的，在小說中不斷穿梭，令人驚、令人喜、令人憂的各自或一起推展故事。

有了這層體悟，要寫《風中誓願》時，我格外關心即將在小說中現身的人物，究竟長甚麼模樣、個性如何？因為什麼樣的人，可能就會發生甚麼樣的事。我思索著要催生他們，是要他們憑藉各自特性，當個精彩的敘事者。即使那些人，在現實中早已存在，我仍得再細端詳，揣摩他們個別的獨特處。

在催生過程，一旦某人物特徵款款浮凸，我怕稍縱即逝，總迅即捕捉，速記員般用文字記下，再有如覽腳畫家般，先蚯蚓蠕行似的曳出幾條線條，勾勒一個草圖。如此再而三，《風中誓願》的文字舞台尚未搭起，那些糾合準備大展身手的人物，早已在我眼前叫喊縱跳，能不教我感受到他們生命的真實、催我儘快安排他們的位置、萌生盡情刻畫他們任何一個動作的意念嗎？

《風中誓願》的書寫，也許可說，是我充當覽腳畫家以後才開始的。自此，我迷醉在那些小說人物的過去、當下及未來，筆尖不停歇地追逐他們可能出現的下一個動作，刻畫他們的血淚生命。

也由於人物刻畫，我不僅洞悉《風中誓願》中人物的細微動作，更摸透他們的曖昧心思；但故事舞台屬於他們，敘事也該屬於他們，想要在死亡縫隙中與中國漁船搏鬥、想要在詭譎詛咒中纏綿愛戀、想要含悲帶泣、想要邪裡邪氣傻笑，我任由他們。若說，在小說故事發展中，我是半個局外人，可也說得通，因為，小說人物在文字舞台，早都是有生命的自由個體，甚至凝聚成有信念的戰鬥體，無畏海洋迷離險惡，我還是閃邊為妙，好讓他們各自演繹親身經歷的故事。

如此吟唱的個體與戰鬥體，並非兩碼子事，它雖是個體的獨唱，也是個體不斷交織，而有了凄美悲壯戰鬥體，這和覽腳畫家似乎又脫離不了干係。因覽腳畫家草圖中的人物，一開始都宿命似的，有磁吸、攀附其他人物的可能，再經由我這半個局外人的刻畫描寫，栩栩特徵與個性的輻散能量，不令所有血肉交纏合唱也難。我就是這麼型塑了小說人物。

我只是想說，我是小說人物的催生者，既已催生了人物，接下來理應讓他們各自成長、發聲，畢竟人物是小說的真正靈魂；小說之所以是文學創作，端賴筆下如你我活生生的人物去敘事，不應當通篇由我敘事而成。《風中誓願》可說是這個理念的實踐，我是

盡可能這麼做。

## 本文

### 第〇章 大頭神來臨

中午，東北季風仍撞牆叫，豬稠裡，一隻剛被強迫斷乳的黑色小豬仔，沒了母乳可吸吮，早惶恐得直了眼、張大嘴藏尾巴，神經質地跟著風哭號，一副短小可憐相。

才一個多月大的小豬仔，約兩尺長，這天才被一個凹頰凸嘴的老婦人，以一千元買來。牠面對用玄武岩打造的豬槽裡的魚肉，一點興趣也沒有，只顧討可憐地垂落鼻吻、雙耳往前趴，朝一個鼻頭尖翹的少女號咷。少女伸出纖細右手，想撫摸牠大大頭顱，牠甩甩頭，依舊張大嘴哭個不休。

及至夜深，賊風更令牠揪心的哭啞了，牠依然在豬稠裡繞圈子打轉不入睡。這時，豬稠西邊緊臨的人家，凹頰凸嘴的老婦人，在從鉛灰雲層透出的朦朧光影中，雙手往前伸直，觸摸刮來的風似的幽幽出現。她雙腳輕輕踏在小菜園，緩緩移近豬稠門，似見又不見地，對還在哭的小豬仔低聲呢喃，最後幽緩清晰的說：「生為詛咒婆，我不詛咒人，陰神會懲罰我……」

老婦人幽緩說完，在朦朧中，右手一舉，一團白米飯糰甩落小豬仔大頭顱上：「現在起，你是大頭神，不可以哭……今晚，他們的十二月二十五，我們的十二月初一……每個月初一十五夜，我都會養護你的靈你的魂。」

老婦人說著，小豬仔似乎立即忘了沒母乳可吮，雙眼深沈的溜視老婦人，不再神經質哭號，開始低頭張嘴找剛才砸下的飯糰吃。老婦人在牠嗯嚕聲中，緩步離開豬稠，進入屋裡。

次日中午，天空依舊灰濛濛，在水泥鋪成的埕庭，又多了許多隨風捲飛的冥紙，它們的背面用毛筆分別畫了鳥頭朱雀和露長牙大嘴婆圖像。剛出海捕土魷魚回來的兩個男人，一走近埕庭，身軀粗圓的中年人，對眉毛粗黑的年輕人說：「昨天我家買來的小豬仔會哭呢，好像知道我們這一次出海只能捕七條土魷，也好像在為大海哭，好多中國漁船跑來跟我們搶土魷。」

「會哭的豬？怎麼哭？是哭沒爸沒母的孤子嗎？」年輕人腳踩黃色冥紙，一副大嗓門，說話聲比船傳轟叫聲還響。

「不信，你來看看。」

年輕人跟隨中年人到豬稠，豬稠門邊早站一個鼻頭尖翹的少女。年輕人斜眼偷窺她尖圓臉蛋上的圓睜大眼時，一陣撞牆呼嘯的大風，折轉撲來，吹襲得那少女扁薄的身子直搖晃。

年輕人心神才一盪，轉頭瞞盼眼神有些深沈的小豬仔，拉開大嗓門粗聲說：「沒在哭啊！你騙我！」

「昨天中午哭得很可憐，今天早上……不再哭……」一小陣細細細細聲。年輕人撇頭，發現那聲音來自那少女玫瑰紅的雙唇，她直望他。

年輕人再轉頭，瞧小豬仔朝他擠來的長長鼻吻，伸出右手想摸它，不意它噴氣的突然拱高。他右手一高彈，身體重心後移，脫口粗聲喊：「公共危險罪哪，我已被判刑六個月……奇怪的豬……想害我……」

那年輕人晃倒，背部貼著那少女柔軟胸前，粗大聲息忽然變得清亮溫和，問著：「豬會說話嗎？」那少女胸前貼著他時，聞到他滿身的大海味道，他倆只這麼一碰，她玫瑰紅的嘴吐了一下，要回答卻沒出聲，頭立即垂得低低。

在這瞬間，小豬仔謎般的眼神，掃向他倆臉孔，嗯嚕的似在說，牠看到了神奇的世界間事。

「噯，小豬仔是在變法術嗎？」中年人已窺見他

◎呂則之

倆的微妙變化，它彷彿正在風中蔓延。

### 第一章 海上買賣魚

「海龍號」在西嶼西方約十哩處，正劃破夜裡颶颶風聲，刷刷挖出一個個破浪。「海龍號」晚上十一點左右起第一次網，捕獲二十四條土魷，半個鐘頭前起第二次網，捕了四十三條，全放進前甲板的魚艙裡，都撒了碎冰冷藏保鮮，任浪頭躍起窺看。而那些六公分見方網目的捕土魷魚網，早收放在後甲板，浸在夜色中，應該捕魚卻沒下網捕魚。

「海龍號」駕駛艙中，渾身被紅燈染紅的年輕船長，身披暗綠色夾克，在冷風灌進駕駛艙時，腰和背肌一陣顫扭，打了個哆嗦，才抬起左手看腕錶，然後悶聲自語：「三點一分。他們說要在整點打燈，有不吃力的大錢可賺……」他冰冷的雙手依然扶住方向盤。這船，是以三節航速行駛，船上只有駕駛艙的紅燈和艙頂小燈亮著，緩緩向西南而去。

船長揚起左眉，不時搜尋海面，在等待映著天光、密布漁火的海上，出現他盼望中的光束。然而，已三點三分，他只聽到砰砰船傳聲，摻雜了隱約海鳴聲，前方海面仍被蕩漾的夜色緊緊壓著，沒出現那艘中國漁船。

船長的眼珠子，在深陷眼窩中溜滾了幾下，睨視不時跳上前甲板的海浪後，才把頭探出艙門，方正的

臉孔扭向幽暗船尾，發出清亮聲：「大紀、空仔，有沒有看到探照燈白光？」「無啦！」「沒……沒……看到！」船尾傳來兩三個人的喊叫聲。船長正要把頭髮及耳上的頭縮進駕駛艙內，一陣浪花沖上他的臉，濕了他的頭髮。他在駕駛座上坐正，抓起一條毛巾揉擦臉孔及頭髮。

「有了，有白光，在南邊。」船尾的嚷聲掩過船傳聲與浪濤聲。

「萬生，你看……閃兩次，隔一陣子再閃兩次……」駕駛艙口跑來一個鼻子像湯匙的中年人，他粗圓的身子鼓凸著小腹，發出有如破浪跌落海面的吼吼聲。

「喔，看到了，忠泰叔……大約兩百公尺外……快叫大紀和空仔打燈回答。錢準備好了，『海龍號』的錢，十萬元，可以變成二十萬元，要在海上做一筆買賣的錢，在我褲袋裡……」萬生直視前方閃爍的白光時，船尾傳來嘈雜聲，不一會兒也接連亮起兩道探照燈白光；白光穿過的海面上，有漂浮的煙霧，也有各種詭譎浪頭；有些小浪則像黑色小豬仔吐白沫般躍起，令他又想到那個尖翹鼻頭、雙唇如玫瑰花瓣的少女，正牽著小豬仔散步。

萬生一聽見南方白光，立即推動速度桿，船速由三節慢慢轉為八節，船傳叫得更響。

當「海龍號」快靠近打探照燈的船，那船艙頂的兩盞大燈忽地亮起，有如兩個巨大眼睛。大燈光亮托出那船船尾處的雙層樓艙，也照亮灰黑腫脹穿著、站在前甲板的五個男子，船與人都透著古舊味道。萬生瞥見「海龍號」上三個船員，早已迎著浪，晃搖地站在駕駛艙口，除了站在前頭的忠泰，還有搖擺不定的大紀、咧嘴傻笑的空仔。在一陣轟隆隆聲過後，萬生叫道：「空仔，燈照船頭，看是不是『閩富號』。」……

# 文明之光，國家之影

◎李敏勇

二〇一一年初，我以〈混淆百年，迷幻煙火〉為題，寫下「鏗鏘集」的歲初篇章；二〇一二年末，我以〈尋覓精神的亮光〉，為「鏗鏘集」留下歲尾註記，這兩年，持續為台灣守望，以詩人之志在文化風景與歷史鏡像中，尋覓家國願景。

這兩年，台灣經歷一次重要的總統大選，有機會以選票終止的馬英九政權，並未終止。從二〇〇八年到二〇一二年四年，台灣人民在政治欺罔中經歷了政治倒錯，經濟困頓的年代。但是混淆百年的迷幻煙火繼續催眠，沒有真正形成公民社會的民主選舉並沒有選擇改變政權，而是放任一個不適格的黨國化政客掌有虛構、殘餘，他者國家權位。國家的陰影因而仍然籠罩著。

從一九四九年就被中國共產黨推翻（某種意義上，意味的是被中國人民推翻）的中華民國，是中國國民黨壟控的黨國。它之能夠繼續存在於台灣，當然是拜東西方冷戰、美蘇對抗的情勢。但是，何嘗不是因為台灣人民錯誤的祖國夢，以及戒嚴體制的威脅、利誘，和未能走出封建性羅網，而有以致之？

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高雄事件，喚醒自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生後的死滅而再生的重建意識。這樣的意識支持了李登輝時代，也支持了陳水扁時代。但是一九八八年到二〇〇八年的二十年民主化、台灣化，並沒有真正改變「中華民國」的黨國性，讓這個不真實的國家真實化。反而因為國民黨中國乞附共產黨中國的政治轉向，讓馬英九復辟中國國民黨政權後，聯手遏阻台灣朝向國家正常化發展之路。

國民黨中國的統治心態，既然是偏安於台灣，它乞附共產黨中國求取代理統治的策略，是千方百計斬斷台灣意識發展之路，從教育與大眾傳播條件灌輸黨國化桎梏，綁架人性。藉扭曲人性追求善美與真實的正向而得以存在的政權，只能在不真實國家的陰影中苟延。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請先把這個國家埋葬掉」。要重建台灣為一個真實國家，就必須這樣。

作為一個巡梭者，我在「鏗鏘集」的專欄以每

週為期，周而復始地反思我們這個國度的「文化」和「政治」現象，也就是「意義」和「權力」現象。在台灣這個社會基盤上，人們支持著一個曲意自稱為「中華民國」的國家。面對著國際的不承認，而在自我欺瞞中，統治者及其權力脈絡卻又任意妄為。

要怎麼形成國家重建的社會動力呢？要「成為真正的人」。在台灣，人、台灣人、台灣國民、世界公民，是我追索人格重建的視野。在特殊歷史構造中，台灣的人格是受到破壞，受到扭曲的。被殖民症候群是有歷史病理的，相對於當下的殖民症候群，少數統治之所以能夠繼續存在，是因為被殖民症候群無法覺醒。民主化，但真正的公民社會並未形成。沒有文化運動的內涵和具有社會運動素質的選舉畢竟無法解構殖民主義的黨國政治，反而成為合法化黨國類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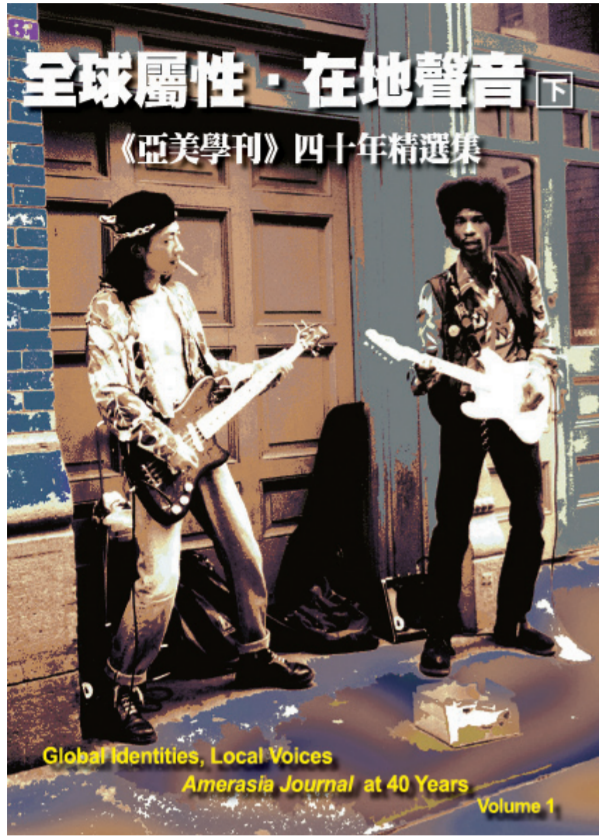


(文接二版)

# 流汗播種，歡喜收割

## 全球屬性，在地聲音(下)出版序言

◎單德興



繼《全球屬性，在地聲音：〈亞美學刊〉四十年精選集》上冊於二〇一二年九月出版之後，下冊於半年之間問世，整個計畫大功告成，距離二〇〇九年七月我與梁志英教授於南京初步商議這個計畫約三年半。有關這個亞美研究史無前例的大型跨國翻譯計畫的重要意義，我已在上冊序言中闡述了九點，此處不贅。此事能夠順利完成，身為台灣合編者的我在此向兩位美國合編者梁教授、唐·中西（Don T. Nakanishi）教授、作者、譯者、兩位助理以及允晨出版社謹致誠摯的謝意與敬意。

整個計畫由志英負責選文，經另兩位合編者同意，並由我組織翻譯團隊。在《亞美學刊》四十年的歲月中，志英擔任主編長達四分之三以上，策畫主題、邀稿、編輯、出版，對於相關學術議題與社會運動的來龍去脈，以及其影響與讀者、社群的迴響瞭若指掌，實為選文的第二人選。為了達到兩人商定的原則——優良譯者，學術專業，完整呈現——所邀請的絕大多數是在台灣從事亞美研究與具有豐富翻譯經驗的學者與譯者，稱之為「精銳盡出」的「夢幻隊伍」（dream team）當不為過。經過譯者悉心翻譯，兩位助理和我反覆校訂、查證、建議與補充，出版社與排版公司大力配合，上下冊能先後順利問世，了卻了衆人多時的心願。回顧這段流汗播種的過程，如今終能歡喜收割，心中充滿了喜悅與感恩。

綜觀精美的兩冊成果，上冊除了三位合編者各自的序言之外，分為「全球屬性，在地聲音」、「歷史創造史家」、「文學為什麼重要」、「作家的世界」與「解放未來」五部分，共計二十二篇文章、詩作、書信與日記，約三十五萬字多達五百一十頁，總共動員了二十位譯者，其中何文敬、傅士珍、王智明和我（文接一版）

民統治的工具。這讓台灣尚無法形塑出一個真實、正常國家。

另一個窺伺台灣的惡意政治勢力是表面上迎合中國國民黨黨的共產黨中國——其實，那是消滅、取代「中華民國」的新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中國對於殘餘在台灣的國民黨中國，視為未完成的革命，必欲取之。中國國民黨面對台灣民主化的政權失落恐懼症，投向共產黨中國懷抱，尋求支持其代理統治。這是台灣面臨的新難題。

如何面對中國？如何「站起來面對中國」？這是台灣追求國家願景的新挑戰。既非在國民黨中國反共的框架下，替代已親共、聯共的中國國民黨繼續其空洞化的國策效應，也非與中國國民黨競逐投降計劃。台灣必須站在主體性，以重建國家的視野擺脫國共內戰殘餘的糾葛。

台灣，可以與共產黨中國一起處理國民黨中國。而不是，讓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合力阻礙台灣追尋自己國家的努力。生活在台灣的人們，應該一起從中國國民黨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不分先後來到，不分語族，在命運共同體意識中，走向自由人共同體的建構。描繪真實的，小而美的新國家願景。在東亞大陸邊緣，在太平洋西南海域，形塑東亞新生國家，創造人類新文明。

要實現國家願景，必須「尋覓精神的亮光」。在台灣，這個自稱為「中華民國」的國家太虛假，文化

四人各譯了兩篇。下冊除了志英和我的序言之外，分為「連結與疆界」、「跨越種族與族裔」、「通往文學與性別之徑」與「美國華埠與文化」四部分，共計十三篇文章與訪談，約二十七萬字，近四百頁，動員了十二位譯者，其中我譯了兩篇。至於兩冊都參與的譯者則有陳淑卿、傅士珍、李秀娟、李根芳、王智明、林為正和我七人。去除重複者，兩冊總計動員了跨太平洋的二十五位譯者。此外，有些雙語作者也自譯其作品：包括上冊的吳冰教授和黃秀玲（Sauling C. Wong）教授，下冊的譚雅倫（Marlon K. Hom）教授和我。而長年從事亞美研究並擔任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亞美研究中心主任的成露茜教授（Lucie Cheng, the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與兩位中國大陸學者合著的論文，於一九八〇年代初分別以中英文出版於中國與美國，也經整合中英版本之後納入下冊，標記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中美學者具體的合作學術成果。類似的情況也出現於我與山下凱倫（Karen Tei Yamashita）的訪談以及黃秀玲有關華埠文學的論文，前者綜合了中英版本的資料與照片，後者則訴諸原先較長的版本，而譚雅倫與黃秀玲分別提供了溫泉之文與《新苗》的影本，以致本書中所呈現的較《亞美學刊》的英文版本更為豐富。

《全球屬性，在地聲音》上冊出版後，承蒙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張淑麗理事長熱心響應，主動規畫於台灣的北、中、南三區分別舉行發表會。北區發表會於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舉行，中、南部兩場發表會也將於今（二〇一三）年三、四月在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與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舉行。北區發表會由曾任學會理事長、現任國科會外文學門召集人、也是本書譯者之一的馮品佳教授主持，我和李有成教授主講，允晨出版社廖志峰發行人致詞。上冊一半以上的譯者踴躍出席盛會，並分享自己的翻譯心得與感受（傅士珍老師和林為正老師分別從新竹和南投趕來，張淑麗理事長更是遠從台北北上），目前在紐約市杭特學院（Hunter College）擔任客座教授的志英也傳來四百五十字的賀詞，由我代為宣讀，兩個半小時的發表會熱烈而溫馨。我在會中報告了整個計畫的緣起，翻譯團隊成員的專長與經驗，特別強調這個計畫不僅是台灣多年來亞美研究與翻譯的實力操演與展現（尤其是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二十年來對於亞美/華美文學的大力提倡與辛勤耕耘），取得華文世界的話語權，更使得華文在《亞美學刊》跨出英文疆界的跨國轉向中拔得頭籌，讓該刊四十年的精華得以透過翻譯傳播給散佈於全世界的華文讀者。

我們不敢妄自尊大，宣稱足以取代原文，然而譯文經過譯者、助理和編者層層修潤與校訂（不少譯者通過志英與我聯繫上作者，詢問翻譯中遭遇到的疑難之處），力求在意思上逼近原文，在表達上清通流暢。此外，本書特將原文的尾注改為腳注，將書目資料譯出，在需要之處加上譯注與編按，並致力於漢字的還原，因此即使通曉英文的雙語讀者，大體上也會覺得比太輕浮了。看看東亞的韓國，看看東亞的日本，看看他們如何在漢字文化圈蛻變，形塑自己的國家形貌？看看東南亞的諸多原漢字文化圈，後來在歐洲不同帝國殖民後，獨立的新興國家，又如何形塑自己國家形態的？台灣不能只連帶於中國，只安於被殖民的牢結之中。

台灣要有動人的建國運動，而不是侷限於黨國體制的權力競奪。在殘餘、虛構、他者的「中華民國」體制下，民主化只會是一場空虛之夢，只會是虛妄的政治權力邏輯，無法建構一個真實國家。看看，前近代時期就脫胎換骨的日本、韓國；看看近現代，獨立新生的東南亞諸國。台灣，要將日本、國民黨中國的殖民傷痕，化為勳章。「不斷尋覓精神的亮光」，才能有動人的建國運動，才能從歷史的悲情中，蛻化求生。才能走向新文明、形塑新國家。

作為一個台灣的詩人，作為一位文化評論者。我在詩裡，也在評論的視野裡，不斷探詢邁向新文明，形塑新國家之路。在自由時報「鏗鏘集」專欄，持續巡梭的篇章，已結集為《文化窗景與歷史鏡像》（一九九一—二〇〇八精選集）、《尋覓國家願景》（二〇〇九—二〇一〇）。《文明之光、國家之影》是二〇一一—二〇一二這兩年的鑑照。集結出版，既為了許許多多讀者的厚愛，也是為了留下見證，並與更多讀者對話，為我們台灣尚未真正形塑的新國家敲打鼓舞的樂音，描繪激勵的圖像。

直接閱讀原文更省時、省事、深入、易解。本書費時精心編製的索引，協助讀者看出前後四十年來作品之間可能的連結，讓具有豐富編輯經驗的志英喜出望外，頗表肯定（善體人意的他特地致函兩位助理，表達謝意）。更何況四十年的精選內容不限於亞美研究中一向佔有重要地位的華裔，也擴及其他族裔，讓人驚識亞美研究的琳瑯滿目、繁複多樣。

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紐約市立大學亞美/亞洲研究所（Asian American/Asian Research Institut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與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亞美研究中心合辦「中文、英文、西班牙語：書寫美洲第三文學」的三語座談會（Chinese, English, Spanish: Writing a Third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s, A Trilingual Program），志英也要我寫幾段文字由他代為宣讀。我則大致說明了整個翻譯計畫的緣起、原則、過程與重大意義，並表示在合編者與翻譯團隊的熱情合作與義務支持下，終於有此「歡喜作、甘願受」（“labor of love”）的具體成果呈現於世。

正如志英在賀詞中所言：翻譯意味著「觀念、文化與文學的相互滋養」（a cross-fertilization of ideas, cultures, and literatures），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已無可否認」，而我們都處於「形塑全球屬性並維持自己在地屬性的過程中」。他對《全球屬性，在地聲音》有如下的評語與期許（借用有成書上的譯文）：「只有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裡，這種未經官檢的跨文化的學術與翻譯才有可能。我希望本書對增進台灣、中國大陸與美洲學者、作家及人民之間的關係有所貢獻。」由於此書範圍廣闊，足以開拓視野，供亞美研究、族裔研究、弱勢論述、華人離散、亞洲人離散、文化研究、美國文學，甚至歷史學、翻譯研究、性別研究、法律學研究以及社會學研究等領域參考。有成也在臉書上表示，希望中國文學、台灣文學、馬華文學與港澳文學的研究者也能找到借鑒之處。因此，至盼廣大的華文世界讀者能在其中各取所需，協助觀察與反思自己的經驗與觀念，連結並重新體認日常生活中的諸多現象。

去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發表會固然是學會主辦的正式學術活動，由編者與譯者分享研究心得與翻譯經驗，出版者說明出版宗旨，現場觀眾提問與交流，但現場的喜樂氣氛卻類似「譯者聯歡會」，對我則更像「感恩會」。我利用這個場合向《亞美學刊》高瞻遠矚的創辦人與資深編輯、具有輝煌研究成果與「譯績」（借用余光中教授的說法）的勞苦功高的譯者、明察秋毫且不厭其煩的助理，以及全力配合的出版社與排版公司，當眾表達感謝之意。對正待校對下冊與撰寫本篇序言的我真是感觸深切。

回顧亞美研究在華文世界的發展，多位譯者多年來參與中研院歐美所華美/亞美文學研討會與國內外的相關活動從播種到生根、發芽、抽枝、散葉、開花、結果，可謂「二十年有成」。這一切都在時光中漸次完成，但也讓人感受到人世的滄桑與生命的無常。在歐美所長期推動相關研究的有成和我已滿頭華髮，發表會當天被張瓊惠老師戲稱為「白頭偕老」。在此書翻譯過程中，山本久枝（Hisaye Yamamoto）於二〇一一年一月三十日辭世。成露茜教授於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辭世，我與智明於該年六月二十日前往世新大學參加「理論與實踐的開拓：紀念 Lucie 研討會」，有機會從不同角度進一步了解這位亞美研究的先驅。吳冰教授於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辭世，除有成於六月八日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參加她的追思會之外，我於六月底前往中國人民大學參加學術研討會時，也特赴其生前寓所向這位華文世界唯一的華裔美國文學研究中心之創建者的靈位鞠躬致敬。儘管哲人其萎，透過他們的文字依然能讓我們繼續分享他們的生命經驗與研究心得，感受到學術與創作可能具有的傳世與淑世的功能。

而在這段日子裡，我個人大部分的時間都身兼學術與行政工作，要再挪出時間進行聯絡、翻譯、校讀、訂正、編輯等工作，有時不免覺得相當疲累。多位譯者也在研究與教學的多方要求之餘，基於學術使命感與個人情誼勉力從事，完成這項翻譯計畫，實為眾志成城，功不唐捐。在整個翻譯計畫的執行過程中，我不確定自己是不是最疲累的一位，卻肯定是最受惠的。由於聯絡，讓我深切體會到大家對這個計畫的熱心支持由於翻譯，讓我重溫學術逐譯的艱辛與回報；由於校讀、訂正與編輯，讓我必須跨越自己鑽研數十年的文學範疇，精讀並思索來自亞美研究各個領域的原文與譯文——包括了中英對照逐字校讀，有疑慮請譯者自行確認或向作者請教；綜合譯者與助理的意見以定稿；以及每一次校對書稿時，從編者、譯者、學者與讀者的多重角度，考量如

何以最佳的方式來向華文世界再現原作者的成品。每一次細讀與校對都讓我驚訝於全書內容之豐富多樣、跨界逾越，慶幸自己因「職責所在」而不得不一讀再讀原先不曾涉獵的許多領域，廣為開拓自己的視野另一種多重角度則來自我國學者的雙語與跨太平洋的背景，尤其是所翻譯的若干文章的作者與內容便具有跨語文與跨洲際的視野，如本冊中討論的以僑資於廣東僑鄉興建的新寧鐵路，縱覽華人在加勒比海三地的歷史，以亞美的觀點重新閱讀雙語作者張愛玲，檢視並重估久遭忽略的美國華文文學/華埠文藝及其中的左派傳統，以及追憶並反思紐約華埠製衣女工的社會運動與罷工及其對世界其他地區可能的啟發……這些題材不僅華文世界的讀者可能感興趣，處理起來往往也覺得比較親切且駕輕就熟，更何況其中許多作者原本就是心儀多時的作家與學者，甚至是相熟的同道與友人。足證《亞美學刊》在選擇跨出英文世界之際，即使旨在呈現一般具有代表性的亞美研究，多少依然採取因地、因（譯入）語制宜的策略，以期獲得較大的迴響，發揮更大的效應。

這種雙語實踐（bilingual practice）與跨語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既是近年來美國研究跨國轉向（transnational turn）的落實，也是跨太平洋打連與發聲（transpacific articulations, 借用智明的說法）的展現。晚近有關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與世界化成（worlding）的理論甚囂塵上，席捲國際學界，然而在給志英的賀詞中，比較文學出身的我，根據多年從事翻譯研究與實務的經驗，表達以下的堅定信念：「沒有翻譯，就沒有世界文學；沒有翻譯，就沒有世界學術」（No translation, no world literature; no translation, no world scholarship）。質言之，世界文學與世界化成作為理念或理想，自有吸引人、發人深省之處；然而理念或理想若不想方法逐步落實，只會淪為空中樓閣，終究影響有限。在進行跨語言、跨文化的溝通與交流時，必須藉由點點滴滴、腳踏實地的努力與積累，才可能逐漸接近目標，或檢驗目標的可行性。愈是遠大的目標，所需要的人力愈多、時間愈長，完成時的成就感也就愈大。費時數載籌畫與執行此一大型翻譯計畫，讓我對此感受尤深。因此，在台北的發表會中，眾多譯者和我都深深體會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腳踏實地完成一件大事的感覺真好！

《全球屬性，在地聲音》上下冊的出版，固然標示了此一跨國大型翻譯計畫的完成，也提供了進一步反思的機會。正如有成與智明在發表會中提醒我們的：在台灣、亞洲或華文世界從事亞美研究到底是在做什麼？其意義如何？有何特色與貢獻？在當前的國際學術分工中，身為華文學者暨雙語知識分子的我們，如何尋找自己的利基？如何積極介入並扮演特定的角色？如何把這個翻譯計畫置於台灣、亞洲、華文世界以及亞美研究等學術建制史的脈絡？此計畫可能的效應如何？有何未逮之處？未來該如何努力以及往什麼方向發展？……這些問題在在值得我們尋思。

多年來我從事的絕大多數是個人的翻譯工作，這次得以與海內外學者與譯者共同進行這個大型翻譯計畫，再次讓我深切體認自己先前在不同場合中有關「譯者」既是「易者」也是「益者」的說法：一方面，譯者在將譯出語「變易」為譯入語時，必須努力維持原文忠實「不易」，並使譯文「平易」近人，以便讀者閱讀與接納；另一方面，譯者在將外來的語言與文化移植到另一個語言與文化脈絡，企盼在新的土壤裡落地生根，成長茁壯，綻放出奇花異果，既有益於原作者觀念的傳播與推廣以及讀者的接觸、吸收與轉化，也有益於自己視野的拓展以及譯藝的精進，更為異文化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善盡一份心力，實為自益益人之舉。而身為編者與譯者的我則以園丁自居，希望透過自身的各種努力，提供友善、健康、營養、豐饒的園地，促進移植過程的順利，讓華文世界得以共享成果。

台北發表會當天清晨，我在日課中剛好讀到聖嚴法師《108自在語》裡的一句話，下午與出席的諸多譯者與聽眾分享：「用感恩的心、用報恩的心來做服務的工作，便不會感到倦怠與疲累。」坦白說，我的能力與修為都有所不足，加上繁重的學術與行政工作，在準備《全球屬性，在地聲音》上下冊的漫長、繁瑣過程中，不免感到倦怠與疲累，數度向內人表示這輩子再也不做這種吃力事了，也向其他譯者表示這很可能是個人此生最後一個類似的大型計畫。然而同儕的合作與鼓勵，義務相挺，大力配合，是支持我繼續前進的最大動力，我個人既然在物質上無以為報，只盼盡己所能以最佳的編輯與出版品質來服務作者與譯者，並回饋亞美研究與華文世界。如今計畫完成，特此向在這條漫漫長路上一道努力的合編者、作者、譯者、助理、出版社與排版公司再次表達誠摯的謝意。就這個大型學術翻譯計畫本身而言，我們已經流汗播種，歡喜收割，並且讓世人分享成果。然而對於亞美研究或更寬廣的學術推動與跨語文、異文化交流，這只是下一輪的播種。若要歡喜收割，還需要大家繼續彼此鼓勵，共襄盛舉，辛勤耕耘，以期待另一回的豐收。

# 金融海嘯之後

## ——哲學經濟家索爾孟的世界之旅

◎康奈爾

用「哲學經濟家」形容季·索爾孟（Guy Sorman），再貼切不過。經濟學，也就是對物質繁榮起因的探討，原本包含在對人類政治和道德秩序的研究當中，後來的現代社會科學，才把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細分為越來越多的學術領域。拿亞當斯密（Adam Smith）這位著名的學者來說，他的研究範圍廣泛，當年稱為「政治經濟學」。在他的認知裡，他的研究跟哲學家對於人類與社會本質的思索並非各自獨立的研究領域。在很多方面，索爾孟算是老一代廣義的經濟學家。他自己曾說，對他影響最深的不是經濟學家，而是廣泛研究人類與社會的學者，例如亞歷西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和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索爾孟寫作時使用的口吻，不像是個越來越專精的學術領域的專家，而像是個知識淵博的學者，以世界公民的眼光和關懷而審慎的態度，檢視我們這個世界的各種狀態。



與世界各地接觸對象對話而來的心得。他好像一直在旅行，但從來不是個普通的觀光客。他顯然有一種天賦，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重要的思想家和重要人物，並贏得他們的信任，甚至尊敬。透過索爾孟的文章，讀者可以看到他與世界各地重要概念的發想者和執行者之間引人入勝的對話。無論是在開羅或紐約與商人或示威者在一起，或者是在馬德里與閣政府高層會議，或者在北京與異議人士討論，索爾孟始終非常清楚人類進展的具體條件，以及人類虛榮心與狡詐所造成的難以克服的障礙。

索爾孟明顯支持市場機制（歐洲稱為「自由派」），但他的判斷和評論都十分持平中庸。有時從他的一篇文章，就可以看出他公允的立場，例如他可能根本不同意某些作者的論點，但願意肯定這些作者的一些觀察。有時候，索爾孟會用稍微不同的角度，回頭去討論他自己先前提出的觀點。比方說，他一度對歐元區的前途深表關切，但後來他對於歐元區將會瓦解的預測表達不同意見：他說，歐洲整合的過程太過重要，「拯救歐元和歐洲的代價會有人承擔」。另一個例子是，索爾孟以同情的角度解讀1968年5月發生在巴黎的抗議浪潮，讓我有些意外。那一年的活躍分子以放蕩大膽和不切實際的幻想著稱，跟索爾孟的務實大相逕庭，但他能體會這些人對於法國社會專制結構的挫折感。同樣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參與者跟索爾孟的觀點與理性大不相同，但他可以退一步，把「占領華爾街」視為主要靠新社交媒體推動的廣泛抗議運動的一部分，進而探討它的意義。索爾孟認為甘地對人間的邪惡極度天真，「有時近乎荒誕」，但他不會吝於給予甘地肯定。他認為，甘地是「20世紀唯一一手未沾染鮮血的主要政治領袖」。

法國知識分子在評論美國的時候，往往很難客觀持平，因此索爾孟在這個議題上平穩而細緻的

觀點特別有價值。他很清楚美國的缺點，但他對歐洲人對美國的偏見——以及跟著歐洲人一起看不起自己國家的美國人——更不假以辭色。有一次他在洛杉磯接受一位右翼電台節目主持人訪問之後，以開玩笑的口吻談到美國和歐洲對政府角色的不同看法，並說自己被夾在中間。他說：「我在美國是個社會民主主義者，在法國是個極端的自由市場提倡者。我想尋求政治庇護，但能去哪裡？」

他始終記得他的啟蒙者之一托克維爾給他的功課，因此他比誰都更明白，美國資本主義能有如此的活力、韌性和創新的能力，原因在於美國基本上是個公平的社會，以及大學和企業之間存在獨特的結盟關係。前國際貨幣基金總裁史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在紐約被控性侵犯飯店服務生的新聞傳出之後，索爾孟沒有論斷史特勞斯卡恩，但他提醒法國人說，史特勞斯卡恩「不是被害人，他並未受到（美國司法制度和媒體）特別的迫害。此事充其量只是顯示美國的文明與法國大不相同」，因為法國人往往不瞭解，自己的許多觀點源自於貴族社會。另一個實例是：索爾孟跟歐洲其他人一樣，合理質疑華爾街主導金融界的情況，但他也樂意感謝美國第七艦隊為全球貿易提供安全保障，並做出這樣的結論：「美國資本主義是最糟的經濟制度，但也沒有一個制度比它更好。」最後，最能證明索爾孟具有深刻的文化同理心與無盡好奇心的事例，莫過於他在全美各地訪問時，都會上當地的教堂，因為「不上教堂，就等於決心不要瞭解美國的文明」。但索爾孟對美國百態的耐心，在莎拉·培林（Sarah Palin）出現之後面臨某種侷限。他形容她是「粗糙反歐的人士……揮之不去的大西部選美皇后」。他說，這位曾任阿拉斯加州州長的副總統候選人「身材玲瓏有致（至少他願意承認這一點），代表了某種美國夢」，但索爾孟最後向她所代表的美國夢投降：「想要瞭解也沒用，更不用說比較了。美國是獨一無二的。」

索爾孟對事情的評斷雖然往往很持平，但這不表示他不會做出堅定而清醒的道德批判。這樣的批判最常出現在他對於中國的諸多評論當中，而這些評論出自於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多年的個人觀察，還有跟中國重要人士的聯繫和往來。比方說，如果讀者想多瞭解最近流亡到美國的陳光誠，就可以在本書中找到許多背景。索爾孟直言稱中共領導人為「暴君」。有些知名的評論員和公眾人物喜歡為中國打壓異議的做法辯護，說它有古老的文化背景，對於這些假裝淵博之人，索爾孟是毫不留情。

他在談論中國時說：「不是每件事都可以拿全球化來解套。當有個危機改變了一切，道德的盤算也可以改變。」在這裡就可以看出，在人類自由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索爾孟既是經濟科學家，也是道德哲學家。

如果要問索爾孟何以如此樂觀，答案似乎在於他知道人類生而渴望自由，而且不斷追求經濟的成長。舉個引發許多爭辯的例子來說，他相信穆斯林最終會選擇「政教徹底分離」，因此，穆斯林將獲得政教必須分離才可能實現的自由與繁榮。索爾孟非常注意人類生存的經濟層面，因此一般而言，他對於拿歷史和文化論點來為某些人基本生活無法改善辯護的做法不能苟同，但這不代表他漠視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文化與歷史因素，或低估智識領導和關鍵政治抉擇的重要性。「自由始終必須靠自由的人警覺和維護。」索爾孟的名言是：「經濟不會說謊。」但經濟本身並不涵括人類生存的全部。他始終沒有忘記，經濟學是一門以人類為對象、為人類而進行的科學研究，而他在提倡經濟自由時，始終保持著對全人類的同理心。他寫道：「資本主義的根本，在於它激發信心，並且提供具體的服務。它本身並無可愛之處。」因此他坦誠分享往往是左派人士會提倡的人道主義論點，但他也不斷警告世人不要抱持跟基本經濟現實背道而馳的幻想。「既想要社會主義福利，又要有自由的經濟，而且要過得幸福快樂，這就是天真的自由主義，也就是虛構的意識型態。」因此，他很明確地抱持反烏托邦的人道主義觀點：「經濟學常見的選擇，不在於選好或選壞，而是得在壞跟更壞之間做個選擇。」

除了資本主義可以提供的「具體服務」，索爾孟在熱心提倡經濟學時，經常觸及最能反映出西方文明精華的精神自由，也就是社會與經濟創新的根源：「西方國家如今已更清楚它們自己的矛盾，更能尊重它們當中的多元現象。但缺了自我反省的獨特能力，西方文明還有什麼價值？」個人認為，這就是索爾孟樂觀的源頭：他深信人類有能力超越嚴重的偏見和意識型態的幻想，能逐步而有效地學習。他寫道：「市場經濟明顯並不完美，而且只能帶來相對的物質進步。這種細微的變化，永遠無法滿足追求完美的人。但預告末日將會來臨的人最終總是落空；資本主義經歷一個又一個危機，但總是能夠回彈，而經濟學家在不斷地學習新的功課。」

在讀完《金融海嘯後的世界——一個樂觀者的日記》（本書將於五月出版，作者亦即將訪台）之後，我發現自己變得更為樂觀。建議各位也細讀本書。

# 時代的回眸：率性一生

## ——讀楊月蓀書信感懷

◎黃肇珩

有一天，突發奇想：如果我死了，誰會寫文章追思我？懷念我！

最先跳出來的，是楊月蓀，他是我大學同班同組的同學，相識相知半個多世紀，沒想到他悄悄先離席了，輪我在他週年追思會中哀悼他，坐下來為他的書，寫悼念序文，人生何等無常！

月蓀是我進大學第一天、上第一堂課、第一位和我打招呼的男同學，他高瘦清秀，一口悅耳的北京話。我們學號相連，學校規定按學號排座位，以便點名。鄰坐四年，縱使分組上課，不排座位，他也一定坐在我旁邊。

月蓀是個天才型學生，滿腦子古怪的點子，觀察力、創意力超強。不喜歡的課，他就翹去看電影，來上課也難得專心，不時傳條子給我，描繪老師的衣著、怪異的肢體語言。有一天教我們社會學的鄭明東教授，穿一套灰色西裝來上課，這是很罕見的，引起同學一陣騷動。月蓀很快發現，老師衣袖上有一個被蟲蛀的破洞，西裝褲的拉鍊忘了拉上去。他為老師設計一套短袖、七分褲的西裝素描，惹得我幾乎大笑，他扮了個鬼臉，眼中含著淚水，又不好意思，自言：「這沒什麼！」我常想，如果他念戲劇系，會不會更有成就！更快樂！

大學四年，我知道的有三位老師，非常欣賞、關懷月蓀：大一國文老師楊宗珍（孟瑛）教授，欣賞月蓀的清純、灑脫和文學才華。新聞組導師、新聞採訪寫作老師于衡教授，對月蓀有「恨鐵不成鋼」



的焦躁，老師愛他的坦真、聰敏、有實力，恨他不專心聽課又不認真寫作業。于老師把關懷放在心裡，費了不少心思，推介月蓀給《大華晚報》社長耿修業。這位大弟子沒有讓老師失望，成為《大華晚報》名記者、駐美特派員。師生關係最密切、最久遠的是歐陽醇教授，他是月蓀的「傾聽者」、一生的恩師，他為學生抱不平，甚至於冤枉了朋友。

畢業以後，我們都在老師的指導下，進了新聞界；他是《大華晚報》記者，我是中央通訊社記者，有時候，我們會在同一場合採訪新聞，他成熟了，隱約還帶著些許外交記者的穩重和驕氣。

一九六三年六月，月蓀出國深造，我和外子馬驥伸到松山機場送他，擁別時，他叮囑：「有空請去看看我媽。」他對他的母親，有一份很奇特、很深刻的愛和關切，他形容母親是一位：「善良、無助、從沒有自己，也找不著自己的女人！」

一九六八年八月，《自由談》雜誌「每月小說」，刊載楊月蓀以筆名「冥客」寫的〈沉入井裡的翡翠鑲子〉。我是《自由談》總編輯，在刊出這篇文章前，先看了全文，直覺他是寫他的母親，文章的結尾，女主角跳井自殺。我忘了我的職責，竟然衝動寫信表示無法接受如此悲涼的結局，因為我太喜歡楊伯母。於是我們隔著太平洋，信來信去，熱烈討論，各表己見。

月蓀來信：

「我很了解你對該文的看法，尤其謝謝妳那麼尖銳看出該文結尾顯得『玄』而『迷茫』。事實上我的意思正在此，因為我無意淹死我媽，或任何一個有形象的女人，妳知道我愛我媽、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但是，我把那個女人丟到井裡，只不過覺得一個女人，不知如何地活了一世，她的確需要那麼一個清涼的結局，那是她一生唯一的報酬。我希望你改我那篇文章不通的地方，但如果可以原諒，請別改它的結局，因為那是我的命！」

他說得好嚴重！

作為主編，實在無權要求作者改他文章的結局；做為他的摯友，我有一分感情的沉重。

我轉念，尊重作者，讓那個戴著翡翠手鐲的女人，沉入井底。我自嘲，她只是小說中的一個虛幻人物。

一九六七年，歐陽醇老師推薦我兼編《自由談》雜誌，這一年，也是月蓀從事文學創作和譯作的重要起點。我邀請他寫留學生、旅居海外華人的所見、所聞、所思，鼓勵他以他家庭為背景撰寫小說，他答應試試。他說，當記者和特派員期間，為報社寫了許多新聞報導、特寫或評論，「除了與政治無關的一些雜感之外，多半不是我心中要說的話。」從此，他暢所欲言。作品散見國內報章雜誌，文如其人，自然、率直，滔滔而談。他不太引經據典，也少用專家學者的辭彙論點，來裝飾他的文字和深度。

月蓀形容：創作，是他品嚐人生過程的一道美味；神來之筆的乍現，絞盡腦汁的苦思，那股自得的苦樂，往往比作品的發表與稿酬，更值得咀嚼。

同時，他也開始翻譯文學作品，第一本，美國作家楚門·卡波提（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於一九七〇年四月開始在《自由談》連載了兩年六個月，受到廣大讀者的讚賞。這本被視為開創報導文學寫作先河的經典之作，由熟諳美國文化、記者兼作家的月蓀翻譯，更見雅達傳神！1973年由書評書目社出版單行本。月蓀在送給我書的扉頁寫著：翻譯這部《冷血》，你與我付出的心血都不少。他感謝我多年來的鼓勵。今天回想，當年對他的鼓勵，無形中也變成月蓀對我工作上的支持；我調任《中華日報》社長，開關

家庭生活版，每週六刊登〈楊月蓀隨筆〉，他整整寫了七年。我轉換跑道，接任正中書局總經理，出版了兩本月蓀譯作。老友，謝謝你！

從一九七三年《冷血》出版，到二〇〇八年八月，他去世前兩個月問世的《借來的時間》，月蓀投入翻譯工作30多年，出版了26部譯作，涵蓋文學、新聞媒體、健康、兩性和哲學等，內容多樣。儘管他視翻譯英文書籍，是純粹樂趣和享受，但也遇到一些挫折和疲倦。二〇〇四年八月廿八日來信：「正在譯李丹的《性與長壽之道》，全是道家思想的修煉，查起資料十分辛苦，往往感到力不從心，很累，也影響睡眠，人是上了年紀。」從不服老的月蓀，第一次談「老」。第二年冬天，他寫：「記憶力衰退到了令自己吃驚害怕的地步，但人邁入七十之後，我學著面對俗世現實，接受甚或努力去享受它，真難！」

一九六七年七月卅日，月蓀在收到我為好久沒有聯絡而抱歉的信時，他「一口氣讀完，久枯的淚泉，竟有些滋潤的感覺」，帶著一股激動，他寫了滿滿四頁的長信，第一次談到人生：作一個「文明世界的人」，妳當然「成熟」了不少；但是作為一個屬於自然的「個人」，妳仍是這個世界難得的、也不會「老」的人。我也是一樣，請恕我如此狂言，然而，這是唯一標幟：「我是『我』的」，我能大言不慚的話，我在生理上是走向生命的另一端了，可是數年來在海外，我雖然「一無所成」（從世俗的眼光看），但是，我至少找到了我自己，證實了「做我自己」，是我一生最大的願望。

那時候，他卅歲，在他離開塵世前的四十二年歲月裡，他一直在「做我自己」：率性、灑脫，做他喜歡的事：教書、寫作、翻譯，他在母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新聞組、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新聞英語、新聞編譯，是位非常受學生愛戴的好老師。最近他的學生王學蘭，到圖書館從報章雜誌搜索到一百多篇楊老師作品，經同學們分類選出一百四十四篇，定名《時代的回眸——楊月蓀作品集》。整個編輯過程令我感動，這群學生以兒女般的愛，獻給終身未娶的楊老師。



# 公眾製新聞的時代來臨

◎新頭殼網站董事長  
優質新聞發展協會理事長 蘇正平

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學者們有關公眾製調查報導平台這類型的報導機制的論述，另一部分則是作為這樣的報導機制，過去一年在台灣具體實踐的作品成績。

「You support, we report」是台灣這個製新聞平台簡單易懂的一個Slogan，它意味著要讓機制起作用，必須有人願意支持，有人願意報導。當然，這些報導還必須具備一定的品質，而且能夠傳播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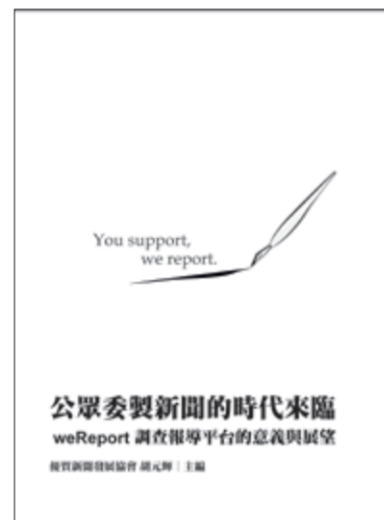
公眾製新聞平台能夠獲得迴響，反映了一種時代需求，那就是傳統的、經由媒體機構所製的新聞，不見得能完全滿足閱聽大眾的需要。

全世界的新聞媒體，這些年來在經濟衰退及網路科技躍進所產生市場改變的雙重壓力下，都面臨必須急遽轉型的經營壓力。這種經營壓力在許多歐美媒體的直接結果，就是大幅減縮高成本優質新聞，尤其是調查報導的產製。於是不管是機構的，或是個人的調查報導，開始尋求市場機制以外的資源，公眾製新聞平台是其中被探索的一種出路。

而在台灣的媒體環境裡，調查報導甚至還沒有形成一種傳統，大多數媒體記者一輩子沒有寫過半篇調查報導。不過，近幾年來，部分的雜誌開始設有研究員，配合主跑的採訪記者，也開始有不錯的調查採訪作品。這對經常飽受批評的台灣媒體而言，是一項應該受到肯定的進步，也代表閱聽大眾對於優質的調查報導開始有一定期待。

在這樣的環境下推動weReport平台，顯然是一種雙重的挑戰，一方面它要鼓吹對優質報導有期待的人，提供足夠的資源來支持這樣的平台，另一方面，它必須號召本來就不多，有能力做調查採訪的獨立記者共襄盛舉。此外，它還必須把weReport的推廣，當做一種培訓的工作，培養一般民眾對調查報導的認知和期待，加強現職記者、離職記者、新聞科系學生，乃至於公民記者，進行調查採訪的能力。要投入這樣的工作，需要超乎常人的熱情和堅持。

情況是如此艱辛，但weReport上線之後一年，還是可以驕傲地展現它這一年的成績。



# 閱讀吧，讓我們在此相遇

◎廖志峰

我第一次自己嘗試的閱讀是一本孤兒回憶錄，那個時刻超越具體時空終生陪伴著我。

悉尼《閱讀》

也許你曾有過這樣的體驗，當你沉浸在閱讀中，世界變得安靜，時間也彷彿靜止，直到某個惱人的外力或聲音將你拉回現實。經由閱讀，你好像找到一條通道，那通道通向一個你可以耽溺放鬆的世界，彷彿有個斑衣吹笛人吹起了奇幻的笛音，你一路跟隨，而後進入這難以具體名之的天地。

在收音機和電視開始大量生產以前或之後的年代，閱讀都是超離現世和接觸世界最簡單的路徑，不管你想獲取知識，或只是想單純地沉浸在一個虛構的故事中。人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經由閱讀去進入那個沒有具體時空座標的世界？到底其中有什麼樣的魔力，我無法具體回答，然而閱讀本身提供一種自足的慰藉，殆無可疑。

在發達的影像生產和影音工業時代以前，書本——不管製造成型的材質為何，都是閱讀的最重要媒介。閱讀對古人來說，除了傳承知識之外，還有極濃重的功利色彩。「十年寒窗」之下的閱讀，為的是伴隨科考取士以俱來的功名成就，光宗耀祖。不僅如此，閱讀還有其他的附加利益，如宋真宗所寫的〈勸學詩〉：「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必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宣揚閱讀的多重利益，目的是勸學。但這首詩背後的真實是：在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之後，一個新的朝代——宋朝興起了，不過，受益於這種軍事叛變的宋太祖，深知藩鎮力量的可怕，亟思加以約束防範，反而開啓了一個重文輕武的時代，開始禮遇文人，怕的是歷史重演。雖然開啓一個具有高度人文藝術表現的輝煌時代，但最終也因國防力量的積弱不振，導致在與外族的爭戰中，吃敗仗的時候多，帝國滅亡。不過，這首〈勸學詩〉中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在千年之後，被日本知名作家芥川獎得主井上靖寫進他的作品《敦煌》，除了小說，《敦煌》還以電影的面貌問世，藉由一部異域殘卷，來想像並描述一個異國的文明盛世，可見文化傳播感染的力量。文化所提供的豐富文本，以不可逆料的方式，影響著不同時代和區域的人。閱讀，是一條路徑，作家井上靖以小說《敦煌》，向一條湮沒的時代道路 絲路致敬。

我們生在一个恩賜光亮的時代，久居在城關不夜的



台北，你很難想像這個城市沒有燈光，缺乏夜間照明，或暗室般的景象。已成為古人的愛迪生，是我們這個時代可以追溯的最遠光源。在愛迪生之前呢？如何進行夜間閱讀，顯然是個棘手問題，一般的人家，可以焚膏繼晷，點起燭火閱讀，如果有皎潔的月光映在雪地上，那就更好了，或者，更

詩意地，把螢火蟲裝進紗囊，權充小夜燈；物質條件不足的人家，也有奇想，藉由「擊壁引光」，引來鄰家的光線，進行夜間閱讀，十分刻苦，這裡有一種儀式性的莊嚴，但也有一種道德上的危險。現代人可能很難想像這種為了求知付出的心力，倒是為了節省電費，「偷接電線」的事件，時有所聞。閱讀最需要的光源和文本皆已富足的現在，我們對閱讀這件事是否仍然興味盎然？文明從茹毛飲血的蠻荒時代躍進到如今的供給豐富，卻彷彿逸失了閱讀的動力。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書中不會再有顏如玉——除了《花花公子》或《閣樓女郎》之外？

閱讀的究竟意義是甚麼？為著知識的追求，探求前人累積的經驗？為了成就功名名祿？或許都是。曾任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紐約大學講座教授，文學評論的泰斗哈洛，卜倫，對閱讀的看法是：人如果想保有一些形成判斷與意見的能力，那就得持續不斷的閱讀……我不把閱讀當成一種教育事業，而是練習與孤獨相處……我們之所以閱讀，是為了鍛鍊自我、認識自我真正的興趣，這樣的體驗是一種樂趣。閱讀是一種探索，也可以排遣孤獨，與此同時，還滿足了獵奇的心理，更有一種美學向度。這種探索在辭世不久的波蘭作家，卡普欵斯基的身上有著最明顯的烙印和印證。卡普欵斯基是波蘭最負盛名的記者，同時也被視為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二十餘部著作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通行世界，曾六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四十餘年的駐外記者生涯，足跡遍及六十多個國家，尤其是拉美、中東，和非洲等人跡罕至的蠻荒地帶，都見到他高大的身影。他曾四次被判處死刑，多次死裡逃生。這麼精彩的人生，起伏跌宕，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在他

# 我在這個世界舞台晃蕩

◎廖亦武

我在回憶，並用嘴巴說出。這不容易。因為此刻的思緒如漫天大雪，不知該說什麼。

因為共產黨，中國變成了故事大國。我曾經在中國撿拾了300多個故事。當局受不了，禁我的書。

我離婚兩次，判刑一次，被抓若干次，被搜查若干次，我終於如我的朋友劉曉波，茁壯成長為國家最危險的敵人之一。去年夏天，因為即將在德國出版監獄自傳《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我面臨十年以上監禁的威脅。於是，我在黑社會的幫助下逃離中國。

流亡之後，我的書在多國出版。我不得不飛去飛來，在若干語言不通的異邦做推廣。去年「911」前夕，我從德國去美國，因為檢查周密，進海關花了三個多小時。正一籌莫展之際，抬頭卻突然望見一黑人警官衝我微笑，胸前鑒著我的英文新著《上帝是紅色的》。我用中文說「上帝原來是黑色的」，他不懂，卻牽引著我脫離迷途。

當晚我入住紐約市中心時代廣場旁邊的旅館，無邊際的樓群，猶如隨時向宇宙發射的無邊際的火箭群，而最醒目的廣告位，卻是「新華通訊社」和「五種液」；也就是中國外派間諜機構和中國最聞名的白酒。

接下來的兩個月，我跑了十幾個城市。紐約法拉盛華人的髒亂差，還有騙子成堆，令我瞠目結舌，以為又回到了祖國境內某一車站或碼頭。密密匝匝的溫州人店舖，往往同時經營手機、褲衩、乳罩、導遊手冊、三明治以及色情書刊。從深不可測的笑容意會到，他們還同時經營暗娼和黑工。我買了一手機卡，付了三個月費用，打了一個月就欠費，我後悔沒有牢記櫃台間的交易宗旨：無需身分，無需信用，無需登記，無需多問。

真他媽的自由啊。我應該在法拉盛找一黑店住下，繼續我在國內的底層採訪。

獨裁中國和自由世界就這樣密不可分。有一部法國虛構電影叫《解放軍佔領巴黎》，五星紅旗遮天蔽日，曾在中國盜版市場掀起暢銷熱浪，可如今，旅遊團早已代替解放軍佔領巴黎……於是野生導遊應運而生。

我多年未見的流亡者朋友某某，迫於生計，也幹上「野導」。有一次，他替北京一檢察官代表團做導遊，心裏忿忿不平，就邊開車邊指桑罵槐。不料坐在副駕駛的胖子笑容可掬地拍拍他的肩：「兄弟你是六四跑出來的吧？受苦了受苦了。其實啊，我們知道的貪污腐敗比你罵的還凶險十倍！今天不談這個了，還是帶我們去買東西好嗎？」我朋友嘆息說，沒想到我早年追求中國民主崛起，最後卻落得狼狽中國崛起的貪腐為生。

沿地球兜圈兒，在舉世聞名的哈佛大學，我呼吸的學術氛圍有些變味兒。中共為哈佛帶來了多少經濟好處，我無從知曉，可我大約明白，因為教授頭銜的終身制，哈佛象徵著一種不朽的「終極權勢」。所以哈佛教授傳高義才恃無恐，出版上千頁的《鄧小平改變中國》，公然為殺戮者辯護。

我不合時宜地在哈佛費正清漢學中心朗讀了天安門大屠殺之夜完成的《大屠殺》，因為情緒激烈或時過境遷，教授們投票的結果，認為視頻不宜放上校園網站。

接著，新西蘭的文學節受到來自中國使館的警告，



在我登機前夕，取消了我的音樂朗誦會。我止步於澳大利亞，剛曬一陣太陽，喝一陣紅酒，新華社駐悉尼分社社長竟欣然牽手找到我，苦口婆心，動員我回歸美麗祖國，並且拍胸脯擔保沒事兒。他最感興趣的還是我的出逃細節。

再接著是前不久，墨西哥出版我的書，要在瓜達拉哈拉書展上做宣傳，中國政府居然致函主辦方，說我是在逃罪犯，命令取消有關我的一切活動。這下子將自由過度的墨西哥人激怒了。我飛抵當晚，警察局長和文化部長（太奇異的搭配）來接站，前後都是警車，一路還拉警報——我是作家、政府要員、還是黑道大亨？我們入住希爾頓大酒店，此後，七個持槍保鏢伴始終，包括吃飯、逛街、接受採訪、演講和上廁所。

翻譯說這比較正常，墨西哥槍支公開買賣，幾年間被暗殺的人數超過五萬。我說暗殺文人幹嘛。翻譯說前蘇聯時期，和你情況相似的「寄生蟲」詩人布羅茨基（後來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接到政府派遺刺客來索命，坐臥不安，就向警局報案。結果政府也給他安排七個保鏢，同吃同睡達兩年，連泡妞做愛也眼睛不眨地立在旁邊。崩潰的布羅茨基只好跑美國了。

還好我只待8天。滾回德國前夕，我與保鏢們在郊外合影，也與3個特種兵合影，我舉起兩把大號手槍，笑嘻嘻的。照片傳回國內，友人們又上傳上推特。引起紛紛議論——墨西哥真混亂啊，連老廖這種底層狗東西都持槍自衛了！如果在中國，還不被當場擊斃？

我站在這兒，掐掐自己的肉，我還嬉皮笑臉地活著，沒事兒。

2012年10月，創立於1886年的漁夫出版了我的《子彈飛》，這是記錄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受害者的新書，其中包括一份來之不易的《死亡名單》。這太不合時宜，因為中國已經騰飛，有資格對人類的普世價值高聲說不。

憑著超級廉價市場、超級購買力、還有超級的投資移民黑錢，面對高居不下的侵犯人權紀錄，中國可以說不：面對西藏人的連環自焚，中國可以說不：面對監獄黑幕的政治囚徒，中國可以說不：面對上訪者、環境污染、有毒食品、法輪功、地下教會、網絡實名制，中國還可以說不。中國說不的聲音愈來愈大，於是西方愈來愈多迎合的聲響，認為劊子手真受到了委屈，抓人殺人也許是迫不得已。而言論審查制度也如飛機安檢一樣，迫不得已——更可怕的是，持這種觀點的小說家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當屍骸遍佈向人間低頭你從來不是國家的敵人你只是一個囚徒

網絡流傳著這首幸福大街樂隊的《冷兵器》。是的，的確像，像譚作人，像劉曉波，像李必豐、許萬平、高智晟、郭飛熊、劉賢斌、陳衛、陳西等許許多多政治囚徒，只是希望祖國愈來愈好的溫和的人。不像我廖亦武，已經對這個國家絕望，對散佈於世界各地的愛國者絕望。主張分裂的我，是國家的敵人，而他們不是。

我將在這個世界舞台繼續晃蕩。如一條喪失國籍的狗，時而哀鳴，時而狂吠，時而來往尾巴沉思。

我的家鄉在一杯酒裏。如果哪天我不幸飛酒，我的家鄉就在白日夢裏。我的內心永無寧日。

精神世界受到閉鎖而物質貧乏的青年時代，閱讀開啓了他的視野，一扇門打開了，一個又一個的邊界在他眼前不斷延展。他在人生晚期所寫的《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其實是用倒敘的縱深描述他一生的啟蒙階段，在冷戰時代的窒息氛圍中，有一種詩意的精神淬礪。這種啟蒙尤為難得的是，他出生在鐵幕之中，物質與精神條件極度匱乏，然而他卻走出不同的人生，成為世界頂尖的記者，也與拉美文學爆炸時期的大文豪們結識，把盞言歡，開創出所謂的魔幻新聞主義。

他的經歷是一則傳奇，一個初出茅廬的記者，只會波蘭語、俄文，英文靠著閱讀海明威的《戰地鐘聲》自修，一下子就被丟進語言銷燬的印度，現學現賣，開始探索這個世界，他旅行的唯一同伴是一本書，希羅多德的《歷史》。他青年時期所能想像的世界邊界是波蘭鄰國，最遠頂多到倫敦或巴黎。然而，命運來敲門，他穿越地球的經緯度，開始採訪印度、中國、非洲。他同時也藉著閱讀希羅多德的《歷史》，穿越在現世與歷史時空之中，對現世進行的戰爭，既印證也對比，多所會心。他從希羅多德的筆法中，學習到新聞寫作的嚴門和採訪的態度。希羅多德，這位出生在二千多年前的希臘人，竟成為這個波蘭青年的旅行良伴，精神導師，誰想得到呢？

閱讀先是一種碰撞，然後進入另一階段，對話。這種閱讀的碰撞，歌德有極深的體悟。1771年，歌德在法蘭克福一場紀念莎士比亞的大會上，對這位文學前輩

極度推崇：他的著作我讀了第一頁，就被他終身折服：讀完他的第一個劇本，我彷彿像一個天生的盲人，瞬息間，有一隻神奇的手，給我送來了光明……那異乎尋常的光亮把我的眼睛刺得疼痛難忍。歌德自己所寫的《浮士德》、《少年維特的煩惱》又何嘗不是一道刺人的光亮，讓後世文人難以超越，至今仍有無數的崇拜者。一部佳作的產生是不是因為閱讀的碰撞，然後以作品來進行具體的對話？

至於閱讀的場所，不僅限於書房，大眾運輸工具上、圖書館裡、咖啡館中、公園、廁所，幾乎隨處可以進行，只要你準備好進入這個天地。閱讀於我，有時是工作所需，有時只是單純為了排遣孤獨。哈洛，卜倫說：善於閱讀是獨處所能帶來的最大樂趣之一，因為這種樂趣最能撫慰人心。撫慰人心，我十分同意，否則我無法解釋何以《哈利波特》可以如此老少同歡，風靡全球？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都需要一點想像，一點魔法：閱讀在引中義上也像隱形斗篷，讓人可以藉一本書遁形，無入而不自得。喜歡閱讀的人，在精神意態上很像是一個世界旅人，為著一個嚮往的風景，飛奔前往。看完一本書之後，闔上，又打開另一本，匆匆上路，再次展開另一段旅程。像這樣的時刻，就是愛爾蘭的桂冠詩人悉尼終身戀戀難忘的時光。以故，他一再返回。

閱讀者彷彿遍歷了千山萬水，經過了春夏秋冬，其實還在自己的書房裡。這趟奇妙的心靈旅程，志同道合者，在此相遇。（文轉自《文訊》2013年2月號）